

文天祥詩選

黃蘭波選注

人民文學出版社

I222.2/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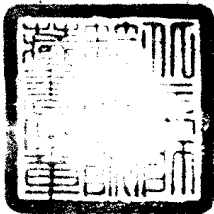
文天祥詩選

黄兰波选注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26146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720146

文天祥诗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90,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4 $\frac{3}{4}$ 插页 3

1979年7月北京第1版 197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50,000

书号 10019·2820 定价 0.42元

前 言

文天祥，字宋瑞，一字履善，号文山。南宋理宗端平三年（一二三六）五月二日出生于江西吉州庐陵县（今江西吉安）淳化乡富田里的一个地主家庭。

当天文祥出生的前两年，即一二三四年，金国在宋和蒙古的夹攻下灭亡了。金亡以后，蒙古统治者的锋镝便转向南宋。一二三五年，窝阔台分兵三路南侵。从此便开始了宋蒙战争。

文天祥的父亲名仪，字士表，号革斋。文天祥所撰《先君子革斋先生事实》说：“先君子……嗜书如饴，终日忘饮食。……蓄书山如，经史子集皆手自标序无一紊，朱黄勘点，纤屑促密靡不到。至天文、地理、医卜等书，游鹜殆徧。……”革斋不但多藏书，还能读书，精细而又广博。文天祥幼年就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由他的父亲教他读书。

文天祥二十岁在吉州白鹭洲书院肄业于欧阳守道之门。守道号巽斋，吉州人；《宋史·欧阳守道传》说：“少孤贫，自力于学。年未三十，翕然以德行为乡郡儒宗。”文天祥《祭欧阳巽斋先生》文云：“先生之心，其真如赤子，宁使人谓我迂，宁使人谓我可欺。先生之德，其慈如父母，常恐一人寒，常恐一

人饥，而宁使我无卓锥。其与人也，如和风之着物，如醇醴之醉人；及其义形于色，如秋霜夏日，有不可犯之威。其为性也，如槃水之静，如珮玉之徐；及其赴人之急，如雷霆风雨，互发而交驰。其持身也，如履冰，如奉盈，如处子之自洁；及其为人也，发于诚心，摧山岳，沮金石，虽谤兴毁来，而不悔其所为。”大概文天祥在青少年时期，受他的父亲和欧阳守道的教育影响很大，词章记诵之学，可能受他父亲的影响较多；在敦品励行方面，可能受欧阳守道的影响较多。

理宗宝祐四年(一二五六)，文天祥二十一岁，成进士，对策于集英殿，皇帝把他的卷子取在第一名，为状元。他的对策，据说不打稿，从早晨写至未时，一口气写了将近万字。其中，除了一部分是针对试题作答的阐明什么“法天不息”之类的天道观念之外，有些议论却能反映当时人民疾苦与政治腐败。例如他说：

今之民生困矣，自琼林（皇帝的私藏叫琼林库）、大盈，积于私贮，而民困；自建章、通天（指宫苑营建，汉朝皇宫里有建章宫、通天台），频于营缮，而民困；自献助叠见于豪家巨室，而民困；自和籩不间于闾阎下户，而民困；自所至贪官暴吏，视吾民如家鸡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呜呼！东南民力竭矣。……生斯世，为斯民，仰事俯育，亦欲各遂其父母妻子之乐，而操斧斤、淬锋镞，日夜思所以斩伐其命脉者，滔滔皆是。

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则授其句读，择其不戾于时好，不震于有司者，俾熟复焉。及其长也，细书为工，累牍为富，持试于乡校者，以是；较艺于科举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车马也，以是。父兄之所教诏，师友之所讲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于流俗者，几何人哉？心术既坏于未仕之前，则气节可想于既仕之

后，……奔竞于势要之路者，无怪也；趋附于权贵之门者，无怪也；牛维马繫，狗苟蝇营，患得患失，无所不至者，无怪也。

当然，这些言论，主要还是为着挽救宋王朝统治权的危机而发的。

文天祥中了状元后，没有几天，他的父亲就病死了。他在家守丧三年，到理宗开庆元年（一二五九）九月，才入京做官，官职是承事郎兼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这时，宋朝得到蒙古军从黄州沙武口渡江的边报，内侍董宋臣请理宗迁都四明，以避敌锋。这个逃跑主义的建议，引起人心很大的不安。军器太监何子举说：“若上行幸，则京师百万生灵何所依赖？”御史朱貔孙说：“釜舆一动，则三边之将士瓦解。”文天祥这时刚到京，就上疏请斩董宋臣以安人心，这就是《文山全集》里的《己未上皇帝书》。这篇奏疏约有六七千字，对于时政多所建议。但董宋臣是理宗所宠信的人，文天祥的奏疏，皇帝置之不理。文天祥到京第一次做官还不上两个月，便因此事弃官返里，不但是牺牲了官位，象那样得罪权贵的事，是冒着生命危险干下的。他当时给吴西林的信中说：“……某不量其愚，辄上书论事。区区以为宗社有故，死亡亦在旦夕；不若犯危一言，有及于今日之难，其得祸与否不计也。”又在《缴奏稿上中书（时吴潜再相）札子》里说：“人非不知爱身，何苦如此冒死？今日之事急矣，惧其至于一旦，则亦不免于死也。”这时，他已表示出为了挽救国家危亡而不顾个人生死的决心。

文天祥不畏权贵的行为又表现在度宗咸淳六年（一二七〇）他当制诰时裁责奸相贾似道的事件上。贾似道是当时威权

极大的宰相，连皇帝都不在他眼里（每次朝见时，贾似道拜了度宗皇帝，皇帝要答拜他；贾似道下朝时，皇帝要站立起来送他，看着他走出殿廷之后才坐下）。蒙古军围襄阳很久了，贾似道不让皇帝知道，谁也不敢告知皇帝，都怕得罪贾似道。有一天，度宗忽然问贾似道：“襄阳被围三年了，怎么办？”贾似道说：“蒙古兵已退了。陛下这话是听谁说的？”度宗说：“刚才有个女嫔说的。”贾似道问明女嫔的姓名后，不久就诬告以一种罪名，把她“赐死”。象这样凶狠无比的权相，稍为怯弱的人是不敢惹他的。度宗咸淳六年六月，贾似道托病辞官以要挟度宗，度宗哭哭啼啼地要挽留他。这时文天祥兼学士院权直，替皇帝草拟挽留贾似道的制诰稿子，稿子里没有夸张表扬贾似道功绩的话，并且义正词严地裁责他。这使贾似道很不高兴，指使台官张志立提出弹劾，罢了文天祥的官职。文天祥还山后，曾在给朱古平的信中说：“七八月以来，此血肉躯，如立于砧几之上，齧粉毒手，直立而俟之耳。仆何所得罪于人？乃知刚介正洁，固取危之道。”看来，这次又是冒了生命危险的了。

从开庆元年至咸淳十年这十五年间，文天祥两次罢官归里，居文山共有五年；其余十年，外任之日较在朝之日为多。先后出知瑞州（治江西高安）、宁国府（治安徽宣城）、赣州（治江西赣县），并一度领湖南提刑。文天祥在各地为地方官时，据史传记载，常有善政。

德祐元年（一二七五）正月，朝廷得报元军渡江，诏诸路“勤王”。文天祥时在江西，尽以家产充军费，组织人民武装力量，起兵“勤王”。四月，下吉州。当时有江西副使黄万石忌文

天祥声名，谤文天祥于朝，遂有暂屯隆兴(南昌)之命。直到七月，才得带兵二万人至衢州。八月，至临安，驻兵杭州西湖上。所过之地，秋毫无犯，纪律严明。朝命以文天祥为浙西江东制置使，兼江西安抚大使，知平江府(治江苏吴县)事。十月，除端明殿学士。

襄阳守将吕文焕于咸淳九年(一二七三)以襄阳降元并为元军作向导。这时朝议追封吕文焕之亡兄吕文德为和义郡王，并以文德之子吕师孟为兵部尚书，意图通过吕师孟叔姪与元军议和。文天祥反对此事甚力，上疏说：“朝廷姑息牵制之意多，奋发刚断之义少，乞斩吕师孟衅鼓，以作将士之气。”且言：“宋愆五季之乱，削藩镇，建郡邑，一时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亦以寔弱。故敌至一州则破一州，至一县则破一县，中原陆沈，痛悔无及！今宜分天下为四镇，建都督统御于其中。……使其地大力众，足以抗敌。”但朝廷对他的奏疏不加批示。后人每以他四镇屯兵的建议没有实行为可惜。明代杨慎(升菴)《念一史弹词》：“若从四镇屯兵计，何至三君接踵危！”便指此事。

德祐元年十一月，元军破独松关，朝命文天祥入卫临安。二年正月，朝廷从天祥议，送二王(即后来的端宗赵昀和帝昺)于闽广，以图兴复。文天祥又请率京师义士二十万背城一战，丞相陈宜中不许。正月十九日，除文天祥右丞相。二十日，文天祥往皋亭山会见元军统帅伯颜，被拘留，驱北行。二月二十九日文天祥与其客杜浒等十二人从镇江逃脱南归，其间经历许多惊险境界，艰难万状。这一段事，文天祥各以诗记之，并在他所撰《指南录后序》里叙述得很详细。节录如下：

德祐二年正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时北兵已迫脩门(国都城门外)，战、守、迁皆不及施。缙绅、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莫知计所出。会使辙交驰，北邀当国者(主持国事的人)相见，众谓予一行为可以纾祸。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动也。……初至北营，抗辞慷慨，上下颇惊动，北亦未敢遽轻吾国。不幸吕师孟构恶于前，贾馥庆献谄于后，予羁縻不得还，国事遂不可收拾。……未几，贾馥庆等以祈请使诣北，北驱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目。予分当引决(自杀)，然而隐忍以行。昔人云：“将以为有也。”至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得间奔真州(江苏仪征县)，即具以北虚实告东西二阍(边帅)，约以连兵大举。中兴机会，庶几在此。留二日，维扬帅(守扬州的主将李庭芝)下逐客之令。不得已，变姓名，诡踪迹，草行露宿，日与北骑相出没于长淮间。穷饿无聊，追购又急，天高地迥，号呼靡及。已而得舟，避诸洲，出北海，然后渡扬子江，入苏州洋(今上海附近海面)，展转四明(浙江鄞县)、天台，以至于永嘉。……

文天祥平生事迹，后人多所褒扬，少有非议；独皋亭山会见伯颜一事，清初学者王夫之(船山)曾加以评论。他说：“当德祐时，蒙古兵压临安，亡在旦夕，求所以存宋者，终无术矣。诚不忍国亡，而无能为救，则：婴城死守，君臣毕命以殉社稷，可也；奉君出走，收馀烬以借一，不胜，则委骨于原隰，可也；死不我值，求先君之遗裔，联草泽之英雄，有一日之生，尽一日之瘁，则信国(文天祥被封为信国公)他日者亦屡用之矣。乃仓卒之下，听女主(指宋太后全氏)乞活之谋，衔称臣纳贡之命，徼封豕长蛇之恩，以为属国于江介；爱君而非所以爱，存国而固不可存，信国之忠，洵忠而过矣。……已入虎吻，而犹祝其勿吞，词愈哀，志愈辱，其亡愈可伤矣。信国之为此也，摇惑于妇人之柔靡，震动于通国之狂迷，欲以曲遂其成仁取义之

心；而择之不精，执之不固。故曰：忠而过也。……故全后之命可以不受，而后信国之忠纯白而无疵。择义以行仁，去其姑息者而得矣。”（王船山《读通鉴论》卷十五）王夫之的亲身经历亡国之痛，深知求活乞命的错误，这段议论，是很有见地的。文天祥经过这次教训，进一步明确了认识，坚定了立场。

是年三月，元把宋恭帝赵昀和皇太后全氏等押送北行。五月，端宗（赵昀）立，改元景炎。文天祥从永嘉至三山（福建福州）行都。七月，往南剑（今福建省南平市）聚兵，计划收复江西。

文天祥在《已未上皇帝书》里早就说过：诸州的义甲，诸峒之壮丁，其间有豪武特达之才；“山岩之氓，市井之靡（闲散的人），刑余之流，盗贼之属，其胆勇力绝，足以先登；其智辩机警，足以间谍。”这时，他便在闽赣边境组织了一支武装力量，他的幕府里招集了许多爱国志士。十一月，文天祥到福建长汀。景炎二年六月，收复江西的宁都、雩都，屯兵瑞金。当时吉州八县半已收复，大江以西所在义兵兴起；婺、处二州的民兵在文天祥领导下活动于临安周围。淮西刘源收复黄州、寿昌；赵璠收复抚州；张堂、熊桂收复湖南湘潭、衡山等地，抗战形势大有转机。但正在文天祥大部兵力集中赣州前线时，后方的兴国突然遭到元军偷袭，他不得不退兵永丰，元兵穷追，八月，在方石岭与空坑的战役中，宋军大败，他的家属皆在空坑被俘，将士牺牲者甚众，文天祥只身逃免，损失惨重。与此同时，元军逼福安，行都陷，张世杰等奉端宗由福州迁泉州，再迁潮州，又由潮州转井陘（广东中山县南海中横琴山下）而达

碙州(广东吴川县南)。端宗年仅十一岁,受海上风涛颠簸,惊悸成疾,不久病死。从空坑败后,南宋抗元斗争的形势转入更加不利的局面。

景炎三年(一二七八)四月,端宗死。五月,八岁的卫王赵昺在陆秀夫等拥立下即帝位,改元祥兴。六月,张世杰等奉帝昺徙居厓山(在广东新会县南八十里大海中)。八月,厓山行朝授文天祥以少保,封信国公。

文天祥在空坑战败以后,移兵广东潮州,继续抗元斗争。他的部下邹颯、刘子俊自江西带兵入广,会文天祥于潮州。这时,元军在汉奸张弘范的率领下,水陆步骑并进:水路由浙江的秀州、明州泛海进攻南宋海上行朝;陆路由福建的漳州、泉州进攻文天祥在潮州的行府。十一月,文天祥得谍报,元军大举至漳、泉,度势不敌,乃移屯海丰。十二月,又移屯海丰北的南岭。一面飞报海上行朝,早作准备。是时文天祥军与元军尚隔一海港,张弘范之弟弘正得海盗陈懿导引,具舟以渡轻骑,文天祥正在五坡岭用饭,元兵突至,猝不及战,遂被俘获。这是十二月二十一日的事。他被俘时,即服脑子(冰片)二两自杀,昏眩久之,竟不能死;部属邹颯自刭,刘子俊等许多将领被俘后皆壮烈牺牲。

文天祥被俘后,见张弘正时,大骂弘正,求速死。被送往潮州见张弘范时又求死。张弘范把文天祥送往厓山,要他写信招张世杰投降,他严肃拒绝,并写了一首《过零丁洋》诗,表示不屈的意志。祥兴二年(一二七九)二月初六日,南宋在厓山的海上行朝覆灭,陆秀夫背负帝昺投海殉国。文天祥被囚

在元军船上，看到亡国惨状，南向痛哭，作诗以弔；并再度坚决地拒绝了张弘范的无耻劝降。是后，文天祥被押送大都（今北京），路上绝食八日，不死。到燕后，元世祖忽必烈想利用文天祥来笼络人心，缓和当时人民抗元斗争情绪，用种种方法劝降，并要请文天祥为宰相，利诱威逼，皆遭文天祥拒绝。最后，忽必烈亲自劝降，仍遭严拒。文天祥被囚四年，经历种种严酷考验，终不变其志节。文天祥在狱中写了许多诗，那首流传千载的《正气歌》便是其一。是时各地人民的抗元活动仍在不断进行，元朝统治者知文天祥终不肯降，留着恐为后患，遂决意杀害文天祥。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一二八三年一月），文天祥被害于燕京，年四十七岁。被害之前，作绝笔自赞，系于衣带之间，其文云：“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宋丞相文天祥绝笔。”这就是有名的《衣带赞》。

文天祥的诗歌创作，可以划分为德祐前后两个阶段。德祐以前，是一般文人的诗，虽然其间有一些诗篇是抒发忧时之感或揭露统治集团的矛盾和罪恶的；但更多的却是题咏匆匆、酬应琐琐之作，无以别于一般调弄笔墨的文人之所为。从德祐起，每篇有一定的内容，大都皆有为而发。它的内容，便是热爱祖国思想和斗争到底的决心；它的有为而发，便是为了坚定抗战意志、鼓舞抗战情绪。

文天祥二十一岁中状元以前的精力是集中于应制举的准

备；中了状元之后，世人慕名，求他的诗文题跋的人纷至沓来，因而徒多酬应之作。他在给他的老师欧阳巽斋的信里说：“先生昔者于应酬亦苦之，今犹若此否？尝蒙见示：每许人作一文，如置一针胸次。今某畏为文词，亦类此矣。”又在另一封信里说：“某寻常于术者少所许可，而江湖之人登门者日不绝。彼诚求饱暖于吾徒之一言；吾徒诚悯其衣食之皇皇，则来者必誉，是故不暇问其术之真何似也。”所以他在德祐以前所作、流传至今的二百四十多首诗中，赠相士、谈命、太极数、银河数、丹士、道士等的诗约有五十首，占了五分之一。此外庆弔、送别、题赠等应酬之作，约百首，又占了五分之二。这当然大大损害了存诗的质量。

虽然如此，文天祥在德祐以前仍有佳篇。他每遇登临、写怀的题材，辄抒发其“颇觉忧时鬓欲斑”（《题碧落堂》中句）之感。他不作无病呻吟以发个人牢骚，也不愿肥遯自甘而耽于烟霞痼疾。当他被迫罢官归隐文山时，每念念于“桑弧未了男子事，何能局促甘囚山！”（《生日和谢爱山长句》）与“青春岂不惜，行乐非所欲”（《山中感兴》三首之一），并表示“终有剑心在，闻鸡坐欲驰”（《夜坐》）的雄心壮志。这种奋发有为的心情，跟屈原的恐鸚鵡先鸣、忧美人迟暮的心情，是相近的，都是以爱国思想为主导。但，这还是忧时之士的诗，未足以窥见他的英雄肝胆。

文天祥在这时期所作的登临写景的诗，并不措意于模山范水的工巧刻划，而着重于触景生情。“修复尽还今宇宙，感伤犹记旧江山”（《题碧落堂》），便是其例。这使情志与景地相

映发，其目的还在言志。他的咏怀感兴之作，并不重视涵蓄、衬托之类的手法；不追求那些“皓齿终不发，芳心空自持”的“以心会心”的隐约韵致。“去年白鸟集，今年黄鹄飞。昔为江上潮，今为山中云；江上潮有声，山中云无情。”（《山中感兴》）“夜阑拂剑碧光寒，握手相期出云表。”（《生日和谢爱山长句》）便是其例。他常是具有“丈夫开口即见胆”那样坦白率真的风格。文天祥是江西人，他的诗从早年起便有“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的江西诗派的风格；但他绝对不学“秋虫噫寒草”的苦吟。

德祐以后，文天祥由于所处社会环境激剧变动，并亲身体验到亡国的惨痛，他的爱国思想的深度与强度显然前后不相同，因此，他在德祐以后所作的诗是用沸腾的热情与模糊的血泪写成的。他的诗不是象一般的文人所作的那样专用文字技巧博得读者的欣赏，而是用喷涌奔迸的感情感染他的读者。

文天祥在德祐以后的诗又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在五坡岭被俘以前，国家尚存兴复希望，虽然他自己遭遇种种挫折、历尽种种险艰，但他永远抱着生死以之的强毅精神，乐观无畏地奋勇前进，他的诗也体现了这种百折不挠的坚苦战斗的精神。当他才从镇江脱出虎口逃到真州，便有《议纠合两淮复兴》那样充满胜利信心之作。后来，在空坑惨败之后，形势日蹙，转徙于闽粤边境，但在“征夫行未已，游子去何之”之后仍能发出“正好王师出，崆峒麦熟时”（《即事》）的豪言壮语。第二个时期是在五坡岭被俘以后。他亲见厓山行朝覆灭，跟他多年共患难的战友全部牺牲，他的兴复国家的志业已

告绝望。这时百念俱灰，但求速死。但他在绝望时并不垂头丧气；相反的，他的歌声更加凄厉而高亢。他坚信这种民族压迫势力的猖狂是暂时的，所以他被俘北行经过南康军时还高唱“乾坤未歇，地灵尚有人杰”（和东坡《酹江月》），又：“江流如此，方来还有英杰”（和《驿中言别》）。他在被俘北行途中，沿途歌咏中原壮丽的山河与历史上杰出的人物以激发人民的抗斗感情。他的希望并未消灭。他自己这时则是“不应留滞久，何日裹遘隙”（《己卯十月一日至燕，越五日罹狴犴，有感而赋》），是要以一死激励群众并增强对民族压迫者的仇恨的。总之，德祐以后，他的诗是使人凛然于忍辱偷生的可耻，瞭然于为保全民族气节而牺牲的光荣。

文天祥有许多感情奔放、词气滂沛的古体诗，《正气歌》是人们所熟知的，此外还有不少佳作。例如，《高沙道中》，运用平易流畅散文化的语言，叙述所历险境，周详而不琐碎，于复杂的记事中贯串一条“自古皆有死，义不污腥羶”的线索。全诗五言，隔句押韵，长达八十多韵，而一韵到底，读来有一种浑灏流转的感觉。叶梦得评杜甫《北征》说：“《北征》、《述怀》诸篇，穷极笔力，如太史公纪传，此古今绝唱也。”这篇《高沙道中》，篇幅之长有逾《北征》，而笔力遒健，终始不懈，实是难得。还有：《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恸哭，为之诗曰》一首，作于目睹厓山行朝覆灭时，通篇七言四十四句，由于每句押韵、两句一换韵，读时更觉声调急促沉痛。“厥角稽首併二州，正气扫地山河羞”，只两句便给了妥协投降政策以极有力的痛斥；“我欲借剑斩佞臣，黄金横带为

何人!”也只两句,声讨了汉奸卖国之罪;“一朝天昏风雨恶,炮火雷飞箭星落;谁雌谁雄顷刻分,流尸漂血洋水浑。”只四句,极写战争的激烈;“昨朝南船满压海,今朝只有北船在;昨夜两边桴鼓鸣,今夜船船鼾睡声。”也只四句,描摹了战后海面凄黯景色,同时刻划出沉痛悲悼的心情。凡此,都体现了语言的经济,而感情奔腾汹涌,驰突而来,欲夺人魄。七言长歌如此才气雄贍,波澜突兀,笔力横逸浩瀚,即在李、杜、高、岑集中,亦不多覩。此外如《言志》、《平原》、《五月十七夜大雨歌》、《六歌》等篇,都有侠气宏拔、快字凌纸的优点。

文天祥的律诗如《赴阙》、《过零丁洋》这两首是传诵最广的;此外也有不少佳作。他的近体诗具有语简意赅、主题显豁的特色,如《题碧落堂》头两句:“大厦新成燕雀欢,与君聊此共清闲”,便写出对国事的隐忧、对苟安忘危的人们的讥讽、对自己遭受权奸排挤的不平情绪,这样复杂的感情,全被囊括在这十四字中,并透露了全首诗的主题思想。又如:“竖子溷人漫不省,红缨白马意轩轩”(《自叹》),写出对那些丧失气节、不知羞耻、反而自鸣得意者的鄙视;“当日本为南制北,如今翻被北持南”(《渡瓜洲》),写出对瓜洲形势转变的无限感慨;“肮脏到头方是汉,娉婷更欲向何人?”(《得儿女消息》)表示自己以身殉国的决心,并以苟且偷生为可耻的道理教训儿女。凡此,都能够以经济手法传达比较复杂的心境。至于《读杜诗》里的三四两句:“耳想杜鹃心事苦,眼看胡马泪痕多。”则不仅是语简意赅,正有些象苏轼所说的,是“前生子美君即是,信手拈得俱天成”(苏轼《次孔毅父集古人诗见赠》)了。

文天祥的绝句，如《脱京口》十五首、《至扬州》二十首等，记述道途苦难，直写所历、所感，毫无藻饰，明白如话，不但用口语来写，有的还用方言俗语来写，把事理说得极其明透通俗。但文天祥的诗有时也用典、也讲究对仗。他用典很贴切，如：“沙边黄鹄长回首，江上杜鹃空断魂”（《自叹》）；“昨岁犹潘母，今年更楚囚”（《生朝》）；“黑头尔自夸江总，冷齿人能说褚公”（《为或人赋》）等，用事琢句颇见精巧。至于骈对，也颇多佳句：“云湿山如动，天低雨欲垂”（《即事》），属对工整，而且写景入画；“雷潜九地声元在，月暗千山魄再明”（《呈小村》），也很精切，铢两不差；“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过零丁洋》）；“坐移白日知何世，梦断青灯问几更”（《己卯十月一日至燕，越五日罹狴犴，有感而赋》）等联，则不但对偶自然，亦有情景交融之致。

文天祥自德祐二年起所作的诗，收在《指南录》、《指南后录》和《吟啸集》里的共有三百七十多首，假如把集杜诗合并计算，则有五百七十多首。这五百多首诗，总的说来只是一个主题：挽救国难，坚贞不屈；也只有一条线索：两次被俘，斗争到底。所以将这五百多首诗看作是一首诗也无不可。这在中国历来的诗词专集中恐怕是仅有的，这也可算是文天祥诗的一个特点。

文天祥于杜甫的诗读之甚熟。他在燕狱中集杜诗为绝句二百首，又集杜为胡笳十八拍；他所作的《六歌》，完全套用杜甫《同谷七歌》的声调形式；五七言长古的结构章法也多胎息于老杜；甚至有些诗句如《正气歌》中的“阴房闼鬼火，春